

## 另類的新媒體文獻：《貓大屠殺》

吳筱玫\*

---

---

書 名：貓大屠殺：法國文化史鉤沉（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作 者：Robert Darnton

譯 者：國立編譯館、呂健忠

出版日期：2005年

出 版 社：國立編譯館與聯經出版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

---

---

\* 作者吳筱玫為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e-mail: smwu@nccu.edu.tw。

很難想像一部法國文化史的書，會和當今的新媒體研究扯上關係。如果以年代做為分類基礎，本書所論述的世界距今兩百餘年，自然無法把它與新媒體研究構連。但如果我們捨棄這樣的分類思維，把關鍵字放在「社會變遷」這個概念上，兩者就有了一些相似之處。事實上，新媒體關注的一些研究課題如「作者」、「讀者」、「文本」、「故事」、「階級」、「知識分子」等，這本書裡應有盡有。

作者 Robert Darnton 乃知名歐洲史學者，原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2007 年退休後，轉往哈佛大學擔任圖書館館長一職。本書內容是他 70 年代教授「心靈史」時發展出來的，後來演變成史學與人類學的專題研究。全書以隨筆方式進行，沒有學術論文的影子，但其論證考究之程度猶有過之。Darnton 在〈序〉中陳述，本書探索 18 世紀法國人的思考方式，他們如何闡明這個世界，賦予意義，並注入感情。換言之，他找尋的是一個早已解體的象徵世界，我們失落那樣的世界已然很久，也不知其演變過程。巧合地，自網路興起，我們似乎又重現了那個時代的某些景象。拾掇本書的精華，可以讓新媒體的研究者，在看待社會變遷這個議題時，感受到些許靈光。

谷騰堡革命以後，印刷術在歐洲深耕了幾個世紀，從啓蒙運動到理性主義，這個當時的「新媒體」，成功將歐洲從手寫時代蛻變出來，成就史上第一波傳播革命。本書的核心思維，便在於探索新的思想浪潮之下，法國如何從一個以神學為本的思想秩序，漸漸轉化到以科學為本的知識體系，這個典範轉移，在歷史上的意義非比尋常。全書除〈結語〉以外共分六章，依時序先後，分別考據農民、工人、一般資產階級、官方、哲人與讀者的文本。藉由解析這些文本，Darnton 揭示俗民文化到菁英文化的過渡，並論證這樣的過渡並非一帆風順，其間仍充斥著階級對立與緊張。

這樣的安排策略看似有條理，卻不一定利於閱讀。本書第一章過於冗長，除非對《鵝媽媽故事集》或《格林童話集》非常熟稔，否則很難進入狀況。好處是，各章之間彼此獨立，沒有一定要從頭讀起的必然性。因此，大家不妨先從第五章〈哲學家修剪知識樹：《百科全書》的認識論策略〉讀起。該篇探索 18 世紀的法國，知識的分類與疆界所產生的變化。當時正逢啓蒙運動高峰，被稱爲「哲人」的知識分子致力於知識觀的建構，最早當屬 Francis Bacon，他畫了兩棵知識樹，一棵是人類的知識，以「理智」下的「哲學」爲主流；另一棵則是神聖的知識，包含「神啓」的本質與內容。Bacon 的知識論巧妙連結了以神學爲本的社會秩序，但不是所有哲人都想承上啓下，其中又以《百科全書》學派的 Denis Diderot 與 Jean le Rond d'Alembert 爲代表，他們展現宏偉企圖，將所有的知識進行蒐集、歸類與重組。在《百科全書》的知識樹中，「哲學」被拱爲知識的主幹，「神學」則成了妾身不明的學科，類歸在哲學之下，一直要到樹的枝椏處，才會看到「天啓神學」這個字眼，與之爲鄰的，甚至還有「占卜」和「妖術」。

很明顯地，《百科全書》的認識論策略乃降低神學等級，以凸顯理性知識的正統性。不過，如果撇開哲人的個人野心不談，會發現不論是 Bacon、Diderot、d'Alembert，甚至是 Ephraim Chamber 的知識樹，都反映了理性主義下的知識構則（espiteme），即知識是有層級的，由主幹而至分枝彼此串連在一起，套用到分類學的概念上，便是由上而下、互不隸屬、一門學科只在一個地方出現。這種知識論如此深刻，涵化在我們的心中，以致於在新媒體的環境裡，以群眾編輯爲本《維基百科》（Wikipedia），也延伸了這樣的特性。然而，一旦群眾可以參與知識形構、同一學科可以在不同地方出現、知識類別多到無法盡覽時，用一棵或數棵知識樹涵納人類總體知識的策略便會產生問題。既然《百科全

書》的經驗告訴我們，沒有什麼知識或分類具有真理價值，那麼同理，《維基百科》下的知識分類，完全不需要遵循《百科全書》的知識構則。所需要的，只是這個時代的 Diderot 和 d'Alembert。

哲人在知識觀上扮演領導的角色，但改變世界卻非哲人的專利。事實上，在那個天搖地動的年代，許多人都看到世界改變，並致力於成為變動中的主宰。第三章〈資產階級梳理他的世界：城市即文本〉一文，探索的是《1768年所見蒙彼利埃市現況》。文本作者不詳，只知他骨子裡認定自己是資產階級（bourgeois）、不折不扣的「正人君子」。表面上，《現況》的目的是向外來遊客介紹蒙彼利埃市（Montpellier）的一場列隊遊行。實際上，作者卻藉行進隊伍的排列順序，對社會階級提出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將行進隊伍劃分成三個等級：第一等級指極為有錢的新興貴族，靠購買官銜獲得身分；第二等為資產階級，雖不如貴族有錢，但穿著、飲食等與貴族無異；第三等級為平民，包括技工、機械工、農民等。這些人以勞動維生，和前兩個等級有天壤之別。

在作者心裡，階級劃分的標準不是傳統的榮譽、職銜，而是財富，於是教士被排除於第一等級之外；資產階級對貴族享有免稅、不事生產諸多抱怨，但樂見自己與貴族相提並論。相反地，他們對平民多所歧視，視平民為騙子、無能、欠債不還的懶鬼。而資產階級的最大的危機，便是平民的越界，因為平民中的上層階級（如外科醫生），有向第二等級靠攏的趨勢，這讓作者深感不安，認為第三等級被隔離的不夠徹底。Darnton 以為，《現況》的意圖不在提供蒙彼利埃市的「現況」，而在展現中產階級構築的新階層、新秩序。他們視自己為啓蒙的主宰，處在世界中心，有自己的階級文化與生活方式，而且已然成為城市的新主人。

《現況》帶來的啓示，是在一個變動的社會中，階級如何洗牌，新興階級又如何看待自己。印刷科技帶來新的知識能量，掌握科技與知識，就可以獲得財富與權力，進而期許自己成爲社會的中堅分子，哲人如此，《現況》作者也一樣。同樣概念延伸之，以網路爲本的新媒體時代，資訊將成爲資產，成就新的資訊資產階級，這些人藉由對科技與資訊的掌握，重新梳理社會秩序。雖然時代不同，沒有人會用「等級」二字區分社會階層，但是他們成爲網路城市主人的企圖心，不會稍減。

資產階級試圖建構新的世界，但不是所有哲人都唱同一個調，Jean-Jacques Rousseau 就是個異類。第六章〈讀者對盧梭的反應：捏造浪漫情〉，談的是 Rousseau 如何導引讀者進入他的內心世界。當時的哲人自命文人雅士，在沙龍、社交聚會中高談闊論，文學則被視爲一種娛樂消遣。Rousseau 認爲這樣的文化無異於腐敗，因爲一旦哲學成爲時尚，它就淪爲劇院與沙龍的時髦樣板。這個信念使他與哲人一伙分道揚鑣，選擇一種反文學的文學表現，其書寫策略，便是挺身躍進自己的書中，不論是《愛彌兒》、《懺悔錄》，或是描寫 12 世紀師生戀的《新愛洛伊絲》，每本書都有 Rousseau 自己的影子。Rousseau 要求讀者的心緊緊相隨，他的讀者也遵照指示，遠離沙龍與人群，因爲只有在讀書不受外來因素干擾時，內在的體會才更深刻。從讀者與 Rousseau 往來的書信，就可以領略讀者的死忠。他成功讓書中故事成爲真實，即便文本是虛構的，在讀者心中也就是真實。這招策略使作者與讀者關係發生了變化，讀者不是詮釋文本，而是追隨 Rousseau 這個作者。這些讀者構成了最早期的迷群，與 Rousseau 來往，也與其他 Rousseau 迷來往，相互激盪之下讓《新愛洛伊絲》成爲 18 世紀的暢銷書。

雖然哲人們動作頻頻，他們卻不是毫無掣肘，第四章〈警探整理他的檔案：文壇解剖〉顯示，他們被警方嚴密監控著。巴黎一位名叫

Joseph d'Hémerly 的警官，專門負責調查寫書的人，並把他們整理成一個個檔案。這份檔案記錄了 1748 年至 1753 年巴黎作家的分佈狀態，其細緻的程度，無異於巴黎文學界的人口普查。從檔案中可以發現，寫作在當時是業餘活動，很少全職作家；性別上男性遠多於女性；年紀從 16 歲到 93 歲都有，平均落在 38 歲左右。作家的背景則是五花八門，除了農民之外，涵蓋所有社會階層或職業別，從貴族、教師，到圖書館員、工人等等，其中還有約百分之十的人坐過牢。

d'Hémerly 檔案最有趣之處，是在於他的分類方式，已有現今「欄位」的概念，於是我們看到「姓名」、「年齡」、「出生地」、「長相」、「地址」、「紀事」這樣的編碼。但該檔案又屬於官僚體系演化過程中的早期階段，所以有非常多的個人聲音，譬如形容某個作家「下流，像蟾蜍，快餓死了」，或用到「非常老實的體相」、「世界上最悲傷的體相」這類字眼。Darnton 相信，d'Hémerly 的檔案是寫給自己看的，他不可能把這樣的筆調呈給警察總長，但是要在勾心鬥角的出版界做好自己的工作，他需要這些細節。這些個性化的描述，對其監控的對象提供了許多主觀性的標籤，無法見容於正統的官僚體系，卻更具人味，概念很像新媒體研究中的「俗民標籤」(Tag)。所不同者，d'Hémerly 的標籤只是個人使用，俗民標籤則在科技的推波助瀾之下，有了群眾共構的可能。

上述幾章研究的都是「文本」。然而，文本不足以完整記錄當時的心理狀態，因為留下文本的，多半是具有知識的資產階級。而啓蒙運動中最大的漏網之魚，反而是《現況》中的第三等級：農民與勞工。爲此，Darnton 在第一章〈農夫說故事：鵝媽媽的意義〉裡，以一些民間口耳相傳的故事爲範例，說明 18 世紀法國農民的心靈世界。

一開始，他舉了一個我們再熟悉不過的故事：〈小紅帽〉。在現

今的版本裡，〈小紅帽〉總有個美好的結局，不管靠自己的智慧或他人的幫助，都能逃出生天，這是因為口述故事到了英國、德國或義大利生根之後，會隨著不同的文化傳統，衍生不同的故事變異。法國農民的原始版本恐怖得多，不但小女孩的奶奶被狼吃掉，小女孩自己也被狼吃了，被吃之前還得把身上穿的一件一件脫光。如此不寒而慄的成分，〈睡美人〉早期版本也有，其大致內容，是已婚的王子強暴了公主，公主連生幾個孩子後還是昏睡不起，王子的岳母則是吃人的妖精，意圖吃掉女婿的非婚生子女。法國農民為什麼講這樣的故事？對於暴力和性，他們是如此直截了當，完全不需要使用密碼。Darnton 以為，只要想像一下，這些故事曾用來哄孩子睡覺，就可以知道法國祖先的心靈世界和我們的心靈世界是多麼地天差地遠。事實上，當時的法國，農民活在一個舉目皆是後母與孤兒、勞力無止盡、感情生活粗糙、壓抑的世界裡。髒亂的生活與短暫的生命，陶冶出屬於他們那個世代的爐邊故事。

從哲人到農民，Darnton 鋪陳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也埋下階級對立的種子。雖然從頭至尾，他都沒有強調這些文本，足以顯示 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即將發生，但字裡行間，他還是有這樣意圖的。譬如他對《現況》作者的評論是：所描述的社會似乎不再區隔成三個等級，而是分裂成「貴族」與「平民」兩個敵對的陣營（第 184 頁）；談到 d'Hémery，則稱這位警官對啓蒙運動的潮流並不敏感，甚至沒有把「哲人」當成一個類別處理。結果，由啓蒙運動帶領的思想長河，即將造成天崩地裂的景象，始終沒有浮出警方報告的表面（第 253 頁）。更明確的，應該是他以《貓大屠殺》為書名，這個選擇，顯示本書第二章〈工人暴動：聖塞佛倫街的貓大屠殺〉，才是全書的主旨，而這一章，正是描述資產階級與工人之間的矛盾衝突。

〈工人暴動〉採用的文本，是一名印刷場的目擊工人 Nicolas Con-

tat 多年後記錄下來的。他篩選細節、安排事件、設定故事背景，以凸顯想要表達的意義。他形容那一場「天翻地覆的貓大屠殺」，是印刷場裡最「有趣」的經歷。為何殺貓？殺貓又為何有趣？Darnton 試圖從解答這些疑惑中，點出階級對立與象徵文化兩個重要元素。

「工人不如貓」，大概是那個時代技工的心境。當時稱為「師傅」的資產階級自比貴族，卻鄙視技工，視他們為可壓榨的勞力、用完後隨時可拋的物品。就連貓的待遇都比工人要好，貓吃大魚大肉，工人吃殘羹剩飯，結果貓大肆繁殖，在工人的臥室屋頂夜夜叫春，師傅卻坐視不理。工人決定自力救濟，佯裝貓叫干擾師傅夫婦睡眠，師母受不了，命令工人趕走貓，但不許驚嚇她心愛的小灰，工人滿口保證。接著，就是驚天動地的屠貓行動，首當其衝的正是小灰，被殘忍殺害後，其他的貓一一落網，工人臨時起意演出一場大審，將所有貓行刑絞死。大伙兒歡欣鼓舞、鬧成一團，之後的幾天，他們重覆模擬這樣的行動，成了當時生活中的一大娛樂。

這件事就算不至於讓人反感，也實在沒什麼好笑的。為什麼這群人殺了這麼多毫無自衛能力的貓，卻感到如此快樂？Darnton 點出其中的文化成分：貓代表巫術，和女人劃上等號，以其為象徵，讓人聯想的不只是暴力，還有性，兩相結合，正好用來影射師母；小灰是師母的化身，所以小灰該死，笑聲則是早年技工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種成分。Darnton 相信，積怨已久的工人，為了宣洩而肆意殺戮，雖然稱不上是法國革命九月大屠殺前的彩排，但在象徵層面上，它確實有造反的意味。這種象徵的隱喻可以被抑制不至於蔓延，也可能引燃全面的暴動。從 Darnton 的論述，可以推論啓蒙的思想浪潮、對立的階級意識與不夠警覺的官方態度，都為法國人民提供了造反的養分。

為什麼這樣一部心靈史的書，新媒體研究者應該感到興趣？理由

很簡單：網路做為關鍵的傳播科技，隱然形成另一股思想洪流，現在面臨的，正是另一場典範轉移的遊戲。印刷帶來統一的文本，人們尋求普世知識的結果，使過往主觀、個人、變異度高的知識內容，淹沒在科學理性的呼聲之中。事實上，在印刷革命之前，人們活在一個統合的感官世界裡，文本的變異度高，以各自的文化為根底，發展出個性化描述。如此看來，新媒體帶來的網路世界，和我們這一輩成長的年代全然不同，反倒和這個消逝了的年代更為契合。當然，每個媒體都有不同特性，網路不是印刷，不可能複製印刷術下的社會變遷，但了解那個年代發生的事情，仍有助於我們釐清即將面臨的變局。可惜的是，我們身在其中，不會知道變局的最終內涵會是什麼！Darnton 還有文本可尋，數位化的文本，反倒更不知如何論證！

• 新聞學研究 • 第一〇四期 2010年7月